坏，以为斯民贻无穷之利。”（《泸定桥碑记》）此时，将化林营移驻沈村防守，千总一员，兵一百名。嘉庆时，在定泸设有把总一员，骑兵和步兵三十六名，属于阜和协（驻打箭炉）管辖。道光年间，泸定桥东岸居民已有百余户，设立一巡检、一千总，管桥治地。

泸定桥的修建，这条进藏的交通线更为重要了，加强了四川与西藏的联系，加强了清廷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理。清代泸定地面为冷边、沈边、咱里三土司部落，清廷驻军予以分别管辖，至清季未发生过大的叛乱。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总督赵尔丰从昌都地区整饰边务返川经过此地，依照民政部奏案进行改土归流，收缴了三土司的印信。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尚未完成，清朝便垮了台（参见民国《川边财政厅泸定县调查表》）。

清康熙时，“泸定”一词，专指其桥。民国以后，“泸定”一词指的是县或城关（桥头乡），而其桥则称之为“泸定桥”或“泸定铁索桥”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泸定桥长一百米，宽二点八米，十三根铁链锚固于两岸，其中九条并列，上铺木板，供人马通行，另四条作左右扶拦。每根铁索有碗口粗，数吨重。当然，今天所见的十三根铁索不一定是康熙年间的，因为二百多年来培修过数次。解放初，在泸定桥西，大渡河上游三、四里处修建了一座钢架公路桥，川藏公路由此通过。虽然有了新修的公路桥，但铁索桥仍然负担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来来往往。面对着“雪浪滔天大渡河”，峻岭深谷悬空摇荡的十三根铁链，追溯它两百多年来在民族团结，开发和巩固边疆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不说清圣祖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粗长笨重的铁链，能在这边陲之地冶练铸造，架设成桥，康熙中期四川经济力量和工程技术也可以窥见一斑。

《清代人物传稿》选载

德　格　类

杨余练

德格类，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出生在群山环抱的明建州左卫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乡），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子，正蓝旗人，封爵和硕贝勒，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1635年11月11日）去世。他是满族（女真）入关前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德格类从小生活在女真族崛起，后金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战火硝烟中，成年后即随父兄征战，授为台吉（蒙语，贵族称号）；而作为一名青年将领崭露头角，则是始于天命六年（1621年）的辽阳沈阳之役。天命四年（1619年）的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击败了辽东的明军主力，攻占了开原和铁岭；一年多后，又为争夺辽沈地区而大举兴兵。天命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劲旅，按左右翼分八路略奉集堡，揭开了辽阳沈阳之役的序幕。奉集堡在沈阳东南四十里，是居沈阳和辽阳之间的军事要地。努尔哈赤进驻城北高岗，就近察看明军的部署和实力，坐镇指挥。驻守奉集堡的明总兵李秉诚，率三千骑出城六里扎营，遣二百骑为前探，与后金八旗左翼接战，败退。日午，德格类随右翼会努尔哈赤于高岗，正准备收营时，得报明军约二百骑就在附近。努尔哈赤命右翼军搜击，明军二百骑溃逃。德格类

等率兵乘胜勇猛冲杀，“至明兵屯集之所，其众二千，见我军惊遁。”①明将朱万良引兵来援，亦不战而溃。奉集堡之战，是努尔哈赤的一次武装侦察，德格类首建战功；明军一触即溃，后金军声威大振。二月，努尔哈赤挥兵攻占了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明朝辽东大小七十余座城堡的官民，俱剃发迎降。在攻战期间，德格类分担两项重任：一是确保辽河渡口（又称三岔河）；二是安抚新降汉人。辽河渡口是交通要津，设有浮桥和渡船，关系重大。德格类两次奉命领八大臣率兵前去察看，防止并击败附近企图乘火打劫的蒙古兵；同时一路安抚新附的汉人，远巡至海州城（今辽宁海城）。海州的官员富户张鼓乐肩舆来迎，德格类传令军中，“不准在乡村驻扎”，“不许扰害居民，抢劫财物”。有两名抢劫财物的士兵，“俱拿住并穿耳鼻治罪”②。德格类的出巡很有成效，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后，统治很快趋于稳定。

努尔哈赤为了巩固后方，扩大统治，对毗邻后金的漠南蒙古诸部先后结盟联姻。德格类二十岁时迎娶了蒙古扎鲁特部贝勒额尔济格女为妻，后又迎娶了科尔沁台吉翁那之女。但是，当时漠南蒙古的情势十分复杂，其中科尔沁部与后金结盟最早而又较牢固，察哈尔部长期与后金对抗，扎鲁特等部则时服时叛。扎鲁特部长昂安，多次截杀后金使者，劫夺财物。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德格类偕阿巴泰奉命率三千骑进行征讨，乘夜疾行，突然袭击，斩昂安父子，俘虏他的妻女，部众一千二百八十人，马牛羊驼共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二③。五月，大军凯旋，努尔哈赤出城四十里相迎。

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努尔哈赤颁行八王共治国政的制度，德格类即参预国政。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故去，皇太极被举继登汗位，德格类成为“议政十贝勒”之一。皇太极即位后，厉行加强集权，发展经济，调整满汉关系，改善汉人地位等一系列改革，引起了部分贵族的不满。天聪五年（1631年）三月，皇太极写了三封信，分致两大贝勒十议政贝勒与八大臣，主动征询意见。在给议政十贝勒的信中说：“嗣登君位，六年于兹，未闻尔等一言规朕之过”，“今闻国人皆有怨言”，“尔等此后凡有所见，即宜直言”④。德格类奏称：“窃睹皇上即位以来，恭敬兄长，友爱子弟，赡养穷黎，生杀明允，未见有所阙遗”，对皇太极的施政改革表示支持。同时提出建议：要“慎选正直之臣，任以国事”；“嗣后诸贝勒有作奸犯科，被人讦告者，即将其讦告之人，从公审理，断隶别旗。庶奸邪知警，而国法昭矣。”⑤这个建议当即为皇太极所采纳。原在努尔哈赤时颁布的《离主条例》中，已有“凡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的规定，但只限于通敌叛乱，实际意义很小。皇太极在天聪五年七月重新颁布的《离主条例》中规定：“诸贝勒有奸属下妇女”，“擅杀人命”，以及“将属下从征效力战士隐匿不报”，“冒功滥荐”等，“原告准其离主”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自由民和奴隶的地位，也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对贵族特权施加的一种限制。同年七月，皇太极改革官制，仿明制设立六部，建立起中央行政机构。德格类奉命“管户部事”，被称为“户部贝勒”，负责分编民户、管理粮赋。后来皇太极称赞德格类主管的户部与吏、兵三部，“办事妥协，不烦朕虑。”⑦这些表明皇太极对德格类的信任和倚重。

后金占领辽东后，立即开始了和明朝对辽西的长期争夺。天聪五年，明朝在辽西兴筑大凌河城，设重兵驻守。七月，皇太极统率八旗大军，对大凌河城实行八面围攻。德格类随大贝勒莽古尔泰率正蓝旗兵在正南面策应，屡败明军；又随大贝勒代善等，阻击并大败明朝的四万援军；还随贝勒阿巴泰等率四千人伪装明军，袭取锦州，因天雾没有成功。受困于大凌河城的三万多明朝军民，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待援无望，最后剩一万一千多人出降，皇太极下令毁城班师。次年二月，户部贝勒德格类奉命将大凌河归降汉人分编八旗，全部迁居沈

阳。

在大凌河之战中，德格类的同母兄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在城西山岗上，莽古尔泰向皇太极面奏，因属下将死伤很多，请将本旗分拨别旗的护军取还。皇太极责备莽古尔泰“凡有差遣，每致违误”。双方争吵起来，莽古尔泰怒视皇太极，“遂举佩刀之柄前向”。德格类上前阻责莽古尔泰说：“尔举动太悖，谁能容汝！”“拳殴之。莽古尔泰怒詈之曰：‘尔为何殴我？’手出佩刀五寸许。德格类推之出。”⑧事后，莽古尔泰因御前露刃，被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归皇太极。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暴疾而死后，德格类继掌正蓝旗，改称“和硕贝勒”⑨，权势扩大。

大凌河之战后，德格类仍然一面领兵作战一面主管户部，而与皇太极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发生并激化。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统率大军，分兵三路，征讨一直与后金抗衡的蒙古察哈尔部。德格类与济尔哈朗等为右翼，率二万骑，日驰七百里，奔袭林丹汗，林丹汗弃本土西逃，不久病死。同年九月，德格类与兵部贝勒岳託，奉命率兵开拓疆土，自耀州旧界展边至盖州以南。次年六月，德格类又与岳託率马步万余，往取明朝统治下的旅顺口。七月，攻下旅顺，俘虏五千三百零二人，并大批牲畜、金银、和财物。皇太极命在旅顺留兵驻防，大军于八月回归沈阳。此后，连续发生三次事件，皇太极愈来愈明显地表示出对德格类的不满。一是汉官诉苦事。天聪八年（1634年）一月，众汉官赴户部贝勒德格类前，诉说差役繁重，请求酌减。德格类将这件事奏闻，皇太极派官察讯，回称“所诉皆虚”。皇太极另遣礼部贝勒萨哈廉，传谕众汉官，指责他们“诳言”⑩。这实际也是对德格类的批评。二是西征违令事。同年五月，皇太极率大军西征，分四路攻掠明朝宣化、大同地区。德格类率东路军，从独石口入边，途中攻赤城不克，“不至上所指示长城之地”⑪，径直与皇太极会师应州（今山西应县）。八月，皇太极命诸贝勒仍率各路军往略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在进攻王家庄时，德格类又违约“逾时不至”⑫。德格类两次违误军令，虽未受到惩罚，但无疑使皇太极心中不快。三是牧场选官事。天聪九年（1635年）六月，德格类奏称：“官场所设监牧之人，不能胜任，当别选才能者掌之。此乃代我八家出牲畜者，不可忽视”。皇太极当即回答说：“汝言误矣。何谓我八家代出耶？若然则国中所有又将谁属？揆尔之意，谓出之我八家者，便宜谨慎，而出之国中者，即当忽略耶！”⑬德格类弄得很狼狈，表示“甚惭”和自责。这里，皇太极当面斥责德格类只关心八家，不关心国家，反映了他们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们之间关于八家分权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实质所在。

天聪九年下半年，以分娶察哈尔汗来归的妻女为导火线，在后金皇室贵族间发生了一次纷争的危机，德格类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林丹汗败死后，部众纷纷来归后金，他们的妻女例由诸贝勒分娶。七月，察哈尔囊囊太后来归，皇太极命大贝勒代善娶她，代善因她贫穷而拒命。德格类、阿济格等奏请皇上宜纳之，皇太极“坚执不从”，德格类等以“上天所赐”再三奏请⑭，争执月余，皇太极违心应允。这在表面上是对皇太极的尊重，实际上近于逼婚。九月，奉命出征的多尔衮，得察哈尔传国玉玺，携带俘获的妻女、部众凯旋。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城远迎。在返回盛京途中，因分娶察哈尔汗的妻女引起风波，皇太极因大贝勒代善的慢上失礼而盛怒，独自先回，一连八天，闭宫不出。二十五日，皇太极召诸贝勒大臣侍卫至内廷，当面斥责代善后又说：琐诺木（即济农）“屡在朕前佯醉，言皇上不当惟兄弟是倚，行将害上，宜慎防之。……尔德格类、岳託、豪格三贝勒，偏听哈达公主、济农之言，欲杀託古，是有理耶？”“尔等悖乱如此，朕将杜门而居，尔等当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⑮这是皇

太极积愤的迸发，表明当时后金皇族间的纷争已处于剑拔弩张之势。琐诺木是蒙古敖汉部长，天聪元年来归，娶皇太极的异母姊哈达公主莽古济为妻，封地开原，成为地位显赫的额驸。莽古济与莽古尔泰、德格类是同母兄妹，她的女儿分嫁岳託、豪格。这种姻亲关系使他们联为一气。莽古济因琐诺木先娶託古的妹妹，因恶妹而恨兄，诬陷託古要谋害自己，请皇太极杀託古。德格类等三贝勒极力徇庇莽古济，也奏请处死託古。而琐诺木与託古亲如兄弟，因而多次借醉酒向皇太极示警，“皇上亦微喻其意”⑯在皇太极的盛怒遣责下，经蒙古诸贝勒会勘，託古实属无辜，德格类与豪格各罚银五百两，岳托罚银千两。代善也被罚，莽古济被禁止与他人来往，经过这场斗争后金国家的权力进一步集中，皇太极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

德格类受罚后第八天，即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1635年11月11日），晚上二更，他同他的同母兄莽古尔泰一样，“中暴疾，不能言而死。”⑰十二月二十六日，莽古济的属下冷僧机揭发，莽古尔泰在大凌河与皇太极公开争吵后，即与德格类、莽古济等结党焚誓，“要夺御座”⑱。经过审讯，莽古济等人伏诛，德格类与莽古尔泰的儿子被废为庶人，两人的坟墓被毁，正蓝旗被分编入两黄旗，改归皇太极直接统辖。

---

①《满洲实录》卷7，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12页。
②《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0，天命6年3月23日。
4月4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4页。
③《满文老档》，《太祖朝》卷51，天命8年5月3日。
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清太宗实录》卷8、8、9、16、9、17、19、20、23、24、25、26、25。
⑨德格类称“和硕贝勒”始见于《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8年4月乙酉。实早于此。
⑱《满洲旧档》，天聪9年12月26日，东洋文库1972年版。

张　名　振

薛　瑞　录

张名振，或作明正①，字侯服，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生②，清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656年1月24日）去世。

张家原籍山西，祖辈入南京锦衣卫籍，迁应天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世居青谿浮桥”③，所以史籍大多说张名振为江宁人④。名振年少，学文不成，改习武艺。稍长，他熟谙韬略，精于骑射、击刺之术。他与胞兄名甲，胞弟名远、名扬，从弟继荣一起，被时人称为“张氏五俊”⑤。

张名振性格豪爽，喜任侠。年轻时，他曾旅游京师，借寓广宁门街北报国寺（大慈仁寺）。后来，他因用费告罄，生活拮据，寺僧解囊相助。当时，魏忠贤专权，太监们经常在京营练习骑射，借以赌博，每负一矢，罚钱一百，寺僧知道名振善射，就主动出钱五千，叫他前去较量。他起初怯战，结果每矢都负，倾囊而归。寺僧再助钱一万，嘱他要把得失置之度外。名振照办，除开始时负一矢外，九十余矢全胜，赢钱数万。以后，他每天去射，百发百中，一年下来积银数千。他厚赠寺僧，但寺僧不受，只收回以前借给他去赌的钱。名振又把赢来的钱用于经商，所得更以万计。从此，名振更加任侠，结交满朝野。崇祯时，东厂太监曹化淳曾延他为上客，曹化淳是名太监王安门下，与东林党亲近，名振也才得以同复社诸人通声息。行人司熊开元因揭发大学士周延儒奸贪而被旨廷杖，张名振虽不认识熊开元，但出